

少年恰知书滋味

铁凝

编者按 暑期来临,正是少儿读书好时节。少儿阅读作为全民阅读体系的基石,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普遍关注。但在少儿阅读的具体过程中,家长、教师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在少儿阅读推广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处理少儿自主性阅读和成人干预阅读的关系?又应如何制定适应不同年龄段少儿的阅读分级标准?与少儿阅读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暑假期间,“双塔”将关注少儿阅读相关话题,期望全社会携起手来,群策群力,让氤氲的书香引领广大少年儿童,走向健康、快乐、幸福、美好的未来。

我一向觉得,为孩子写作或者描写孩子,是庄重且并不容易的事业,因为孩子虽小,书写孩子的人却应有一颗足够大的心,那首先便是平等之心吧。每当我在孩子跟前蹲下来,看着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话或者听他们说话,我常常发现那本不是屈尊俯就,让对方感到安全。相反,我总是想到,面前的孩子,他们何尝不是藏在我们灵魂里的巨人?我的写作最初是从儿童文学开始,多半因为那时我也刚从少年脱胎出来,自发的因素居多。我写过一点关于孩子的故事,但不等于我对他们的世界了然于胸。真正成人之后,当我再将笔触试探性地伸向孩子,除了坚信孩子的情感世界埋藏着许多大人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宝藏,还缘于那些影响过我的中外儿童文学大家,他们的著作不仅带给我童年、少年无以替代的快乐,更奠定了我终生相信生活、相信爱的生命根基。尽管我在幼儿园拿起第一本书时,还是个不识字的人。

我识字了,当我能够磕磕绊绊地把小人书每一页图画下

面那简单的汉字读成句子时,心中的快乐无法形容。我忽然发现世界真大,而我也不渺小,因为我会阅读了,我就成了一个主动的人。我可以不再苦等收音机里每天固定的那一点故事时间,我在任何时候打开书,都能够同书中的故事直接交流。阅读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字,那一颗颗美丽的汉字多么神奇,它们牵着我的眼睛奔跑,如饥似渴的识字又不断带动着我的阅读。《克雷洛夫寓言》《没头脑和不高兴》《宝葫芦的秘密》《小布头奇遇记》《格林童话》,丰子恺的配字漫画,高尔基的《童年》和冰心的《小桔灯》……在父母忙于工作,没有更充裕的时间关注孩子时,这些好书给我乐趣、宁静,激发我对人和世界的无边想象,让我知道了友谊、忠诚、勇敢这些词,开启着我心灵的诸多空间。

有人说小人书这种艺术形式至少影响过三代人。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小人书是我最初的文化启蒙和文明启蒙之一。我和我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有过买小人书、在一分钱即可租到一本书摊上看小人书、同学间互借小人书的经历。我们传看最多的有《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小兵张嘎》《青春之歌》《嘎达梅林》《江姐》《红嫂》《方志敏》《赵一曼》……至于和同学在读完同一本书之后讨论感想,更是我难忘的少年记忆。

后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那几年的阅读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孙犁的《村歌》,还有盖达尔的《少年鼓手的命运》、施特里马特厚厚的长篇小说《丁柯》。我被丁柯这位德国乡村少年深深吸引,尽管看不懂书中那异国土改、新旧生活的复杂矛盾和纠结,但这些生活给主人公丁柯带来的巨大影响,丁柯充满期待、善意、迷惑、好奇以及淡淡惆怅的丰富内心,他和父亲、妹妹、朋友、村人的情感起伏,从始至终打动着我,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孩子也能成就一本大书。那里有诚实、细腻的感情,有遥远的、但全人类的孩子都能会心的亲切对话和生活。

我要特别提到盖达尔的作品,当年在我家被大人遗漏的零星书籍中,有一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盖达尔选集》,

草绿色封面,一尊盖达尔身穿军便服、左手捧着一本书的暗金色全身铜像印在封面上。这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作家脸朝读者微笑着,左脚迈出一小步,仿佛正向我们走来。我从这部选集中读到他的《少年鼓手的命运》《远方》等名篇。盖达尔笔下那些少年的命运强烈地牵动着我的心。我对作家笔下那些苦痛、压抑的背景尚没有更多能力理解,震动我的是身在其中的少年那温柔的向上情怀,那干净的向好心灵,他们有隐秘的无处倾诉的忧愁,因为向上和向好,那忧愁便也成为了动人心弦的力量。我读着盖达尔们,感谢他们的书抚慰了那个年代的我,那个有时感到无聊和茫然的我。好书确能擦亮人心,好书确能救人。

很久以后,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之后,偶然读到鲁迅对盖达尔的评论,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为向国人引进盖达尔的作品做了大量努力。鲁迅在评论盖达尔的作品时鲜明提出了写儿童的书要使儿童认识到真实的生存环境,要培养儿童的好奇心,同时让他们自己也要求真。我想,这也就是盖达尔、施特里马特的作品当年那么强烈地打动我的重要缘由。他们诚实、平等,且无保留地相信少年读者们的判断力,他们情真意切地写出了生活的艰难和欢乐,生命的壮丽和坚韧,不回避笔下少年人的生存境况,发现并赞颂孩子们在经历着这一切之后的阳光、勇气、向善和自立的觉醒,他们的书就那么真实那么美。他们也获得了少年读者长久的信任,这信任不仅是相信书中的故事,还有对阅读本身不倦的依恋和爱。

走进孩子的心是不容易的,那里有溢满生机的憧憬,那需要一个成年人始终保有成长的能力,或许才能如孩子那样,在生活的笑靥或泥泞中看见白云里有奔跑的马群,听见蒲公英在春风里的合唱。我在孩子面前蹲下来,对孩子说话或者听孩子说话,我感到当我试图看懂他们时,孩子也无时不在对我们幽微的内心作着极为细致的观察和判断。那时我常常想说,孩子,请带上你的阅读,也带上我和你一起成长。

电视剧《大决战》宏大叙事 精细表现

邱伟

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历史,这部鸿篇巨制从多个视角“精写”解放战争,让重大题材创作面貌一新。

三大战役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大决战》史诗般呈现了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相比观众熟悉的电影《大决战》三部曲,电视剧《大决战》以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背景,49集的篇幅用更丰富的内容、更宏阔的视角展开叙事。比如,电视剧开篇就把三国四方的利益纠葛交代得很清楚,在二战后重塑世界政治格局的大视野下,历史的来龙去脉在剧中讲述得更加清晰明了。

《大决战》第一集便展现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庆谈判。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在重庆进行着关于“和平建国”的谈判,一面却在调遣全国的军队开始秘密备战。与毛泽东见面后,王劲松饰演的蒋介石,表面盛情宴客,实则话语中暗藏机锋,以“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暗示了对合作的拒绝。对此,由唐国强饰演的毛泽东回应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一番话,不仅化解了蒋介石的刁难,也再次表达了对重庆谈判的诚意和态度。两人随即就“孙中山的帽子”又展开讨论,实际上体现了两党之间的博弈,这段戏把语言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唐国强与王劲松两位实力演员表情处理非常细腻,观众在投入剧情的同时,更能细品出人物的心态和格局。

该剧多角度展示了解放战争的过程,通过讲述战略、战术和战斗三大层面的故事来立体表现,其中既有国共高层之间的博弈,又有国共两军将领在战场上的对垒,同时剧情焦点极大地倾斜于普通战士、普通百姓对三大战役的奉献,体现出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比如剧中虚构的英雄角色武雄关,这位解放军排长在电视剧开篇是以主角式人物来呈现的,却没有主角光环,在第三集就英勇牺牲了,这份向死而生的壮怀激烈打动了无数观众,也呈现出战争的残酷和真实。

《大决战》剧作的亮点是追求真实,达到一种真实呈现历史真相、真诚打动观众内心的观剧效果,上到领袖、将领,下到士兵、百姓,都有足够真实的细节表达。剧中揭露了国民党官员的丑恶行径。面对内部朽坏坍塌式的贪腐,蒋介石虽明了于胸,却选择“用利益买忠诚”。与之对应的则是在解放区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苏青饰演的女战士王翠云,克服各种困难发动农民,让农民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调动农民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剧情的鲜明对比揭示了战争走向的深刻原因和历史必然。

随着剧中解放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斗画面也越来越恢弘。《大决战》集得了国内顶尖的主创阵容,再现了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和震撼人心的时刻。在战斗场景中,更突出了在战火中穿行的镜头语言,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围城》重印本里改坏了的句子

韩石山

编者按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令人回味无穷,众多读者围绕小说思想内涵、语言特色、人物塑造等方面品评颇多。而我省作家韩石山先生作为资深“钱迷”,读《围城》已写下百余则札记,今选取其中十则短章与读者共享,一者,可知小说语言语境有其时代性,亦可对当下民国题材创作有所裨益;二者,可窥韩石山先生读书方法、治学精神之一斑。

我是个“钱迷”——钱锺书之迷。最爱看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围城》。手头此书的版权页上,标明1980年11月出版,实则提前上了市。当年10月下旬,我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就买下了。买下就看,很是喜欢,往后有新版本出来,或是相关的书籍出来,常是见了就买。比如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围城〉汇校本》,虽多有诟病,我还是买了且珍视之。因为有了这个本子,就等于有了1947年晨光出版社出的初印本。1980年出的这个新本子,学界称之为重印本。出版前,钱先生说“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围城·重印前记》)。应当说,许多修改是增色的,但也有不少句子改坏了,至少是不甚妥当。兹举数例,以就教于高明。以下文中,黑体字是初版本上的句子,对照着说的,是重印本上的句子。

1.(方鸿渐)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的旧历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的比往年厉害,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是民国二十六年。

重印本中,“民国二十六年”后加“[一九三七年]”。写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春夏秋冬,往往含糊不清,写上年月日,什么都有了。而写个年月日,是最无文学意味的。钱先生的这个办法,可说是将年月日糅合在情景描述中。无意中说了个“一天”,趁便说是七月;因为热,便有了“兵戈之象”;何以如此?因为这是民国二十六年。这样一来,说出年份,不是累赘,而是必须。重印本加上“[一九三七年]”,想来是进入新社会几十年,怕年轻人不知“今夕是何年”。虑事是周到了,行文上则是多了一个累赘,让人以为看的不是小说而是学术论著,遇上个“随文注”。写民国的事,用了民国纪年,恰是一种语境。此处标注,大可不必。

2.又忙解释一句话:“这船走着真像个摇篮,人给他摆得迷迷糊糊,只想睡。”

重印本中,“又”字改为“她”。这是钱先生从了俗。小说叙事中若下一句顺势即知主语为谁,多以略去为佳。尽量少出现名字,和代名之词的他、她等。以此理而论,初版本上面见了鲍小姐的名字,此处用“又”是对的。钱先生此改,或许是考虑到当时的阅读习惯,实则大可不必。

3.八月九日下午,船到上海,居然战事并没有发生。“居然”一词,重印本改为“侥幸”。“居然”有“庆幸”的意思。此前已战云密布,天天都有开战迹象,到了八月九日,竟未开战,用“居然”甚合书中人物的心态。作者如此落墨本无不妥。重印此书,顺手修改,将“居然”改为“侥幸”,语义是平和了,那种钱式的反讽也就没了。

4.孙小姐长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大开,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

“长脸”,重印本加一圆字,成“长圆脸”。这个地方,按说不必讲究,长脸不会像个驴脸,圆脸也不会是用圆规画下的。再就是,无论旧小说新小说,描摹女子脸型,绝少用“长圆脸”。长而圆,下巴较额头窄,那就是瓜子脸,再长就是锥子脸;下巴的宽窄略等于额头,那就是冬瓜脸了。若一开始就写了个长圆脸,可说笔下有误,虑事不周。此处却不是,是已写

了长脸,初版本未改,几十年之后重印本才改,只能说有意为之。究其心思,只会有两种情形,一是与别的人物区别开来,一是适应书中的描写,比如下面说了“两眼分得大开”,若长脸则所分尺度有限,圆些才会分得更开。与别的人物区别开来,又分两种情形,一是书中人物,一是真实人物。这里是书中,且详加探讨。书中着力描写的女性,只有两位,一是苏文纨,一是唐晓芙。写唐晓芙在第二章,出场就写到了,说“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对苏文纨没有这样写到脸上,但我们从一些描写的句子上,得到的观感是,整体修长而单薄,同比例分配,脸型也该是瘦长而清秀。这一层,从第八章在香港赵家再度出现的样子,也可得到反证:“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现在胖得多,过去必是瘦得很。重印本修订时,将长脸改为长圆脸,显然是往唐晓芙这边靠了靠。好多探讨文章都说,唐晓芙是书中唯一未有微词心存爱意的的女性,还有人认头,说是像了她云云。再说可能虑及的真实人物,一是疑似与钱有恋情的赵萝蕤,一是性格为钱夫人的杨绛。这上头,易遭物议,不说也罢。总之,无论何种情形,都是个不必,只能说作者用心缜密而不可名状。

5.那女人把孙小姐从头到脚的打量,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志士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脸出头的黄牙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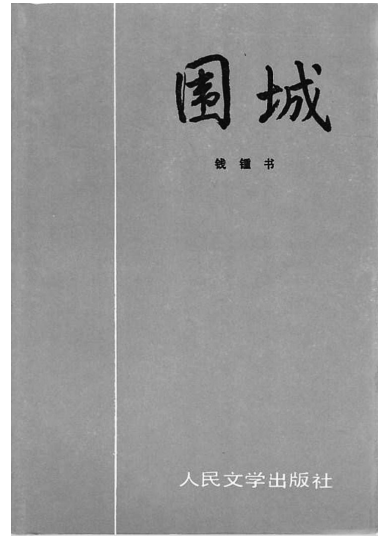
重印本里,“志士”改为“侠客”。有个情况读钱著少的人或许不知,《围城》刊载及出初版本,曾受到进步文化人士的激烈批判。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初,钱先生不愿重印此书,说写得不好,只能是托辞;当年批判此书的人大都健在,不愿再度授人以柄,也该是难以解开的心结。不得不允诺重印且修订之际,他自然明白该改些什么词语,什么句子。相对于“志士”,“侠客”通常谓之一介武夫。略一思忖,笔头便偏向了保险的一边,嘴再尖的男也无从置喙,舌再长的妇人也难以诟病。只是如此良苦的用心,是艺术的忠诚,还是世俗的权衡,尚难遽下断语。再,志士免了嘲讽,而侠客又何辜无端受此奚落?又再,即视侠客为一介武夫,下文的“胸襟”岂不失了着落?至少也是不太匹配。

6.鸿渐看见一个烤白薯的摊子,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做成这摊子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仔细瞧,正是他,买了山薯递给丁墙在吃。

重印本中,“有人做成这摊子生意”,改为“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先不说改后的句子,说改之前的。这是个口语句子,简练,一个“的”字都没有,一看全明白。“做成这摊子生意”,不管是看字还是听音,都明白是在这个摊子上买下了白薯,不会理解为掏钱把这个摊子买下了。改后的句子,加了三个字,分别是“正”“个”“的”。一个一个地说。“正在作成”,时间明确了,表示交易正在进行中,可后面的“脸对着墙在吃”,岂不到了另一个时间点,怎么可能同时看到买又看到吃且立马判定其人为李梅亭?加一个“字,成了“这个摊子”,莫非此处还有另一个烤白薯摊子?第三,加了个“的”字,成了“这个摊子的生意”,莫非不明确标示生意与摊子之间的从属关系,李梅亭能把摊子买下吃了?几十年正确语法的熏染,积久成习,生是把一个活泼的口语句子,改得了无生气。

7.(高松年说:“别说他们还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养了孩子,丈夫的思想有问题,也不能罪及妻孥……”

重印本中,“养了孩子”,改为“生了孩子”。我以为还是“养了孩子”好,次之,“养了小孩子”也行,独独这个“生了小孩子”没有道理。“养了孩子”是口语,重在完整的表达,连生带养都有了,再怎么也不会有歧义,让人认为是领养了别人的孩子。明确了一个“生”,成活与否,尚在两可;若生而不活,“罪



《围城》初版本(左)与重印本封面

及妻孥”的“孥”字便没有了着落。写小说,笔锋犀利之人,多是前后照应,自然成文,过后修订,多半会顾前不顾后,让文气打了“格登”。

8.鸿渐忽然想起一件事,说:“咱们这次订婚,是你父亲那封信促成的,我很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把它检出来。”

重印本中,“检出来”改为“拣出来”。实则不必改。检,翻检的意思,还是找书信的常规动作。“拣”是拣拾,是一下子拿起,纵有“挑拣”的意思,其对象也不会是书信。这种地方,写下什么,就是什么,细一思忖,常会觉得不妥,要改了。三联书店的《钱锺书集》,有一册为《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正文前有一帧钱的手迹,题为“石语”,正文仅一句话:“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圆女又订成此小册子。”绛即其夫人杨绛,之后的动作用语,不就是个“检”字吗?

9.(孙柔嘉说:“快去罢!他提拔你做官呢,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我们是不配的。”

重印本里,“我们是不配的”,改为“我们是配不上你的”。此一刻,孙柔嘉是夫妻吵架说气话,拿赵辛楣挖苦方鸿渐。既说了“说不定还替你找一位官太太呢”,接下来的“我们是不配的”,定规是说她配不上方鸿渐。这里的“我们”,是汉语语法的一个特例,复数词语用作单数自指,多用于弱势的一方,增加委屈的情感。比如京剧《梅龙镇》里,正德皇帝调戏了民女李凤姐,李唱道:“军爷说话理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钱先生年轻时是顺势写下,自然无误,到了这把年纪修订,觉得明明一个女人,怎么能自称“我们”,没有多想,便改为“配不上你”,让这个“我们”在对应上缩为一人。考虑是周全了,女主人委屈的情感就减弱了,不能说不是百虑之一失。

10.方鸿渐和衣倒在床上……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了灯的夜,他睡着了。

重印本中,“像灭了灯的夜”,改为“像灭尽灯火的夜”。此一改动,全无必要。这里说的是方鸿渐在妻子走后,发泄一通,精疲力尽,和衣躺在床上,不知不觉间睡着了。朦胧中,其感觉的程序先是昏天黑地合拢,继而裹紧,终于坠入黑沉沉的睡眠之中。此刻的感觉,“灭了灯”是一种泛指,如同我们平常说的“黑灯瞎火”。你不能细究,说这几灭了灯,天黑了,别处的灯不灭,会有光线照过来。为了周全,叫天全黑,就得“灭尽灯火”。这上头,只能说老先生多虑了。

历年下来,读《围城》札记共有一百多则,多是赏析,腹非之处,当然不止这么多则。有的较为复杂,一写就长,只有舍弃。我不敢说我的感觉全是对的,极有可能是佛头著粪,褒贬前贤。不管批评者说什么,我都打心里喜欢,毕竟是你看到了这篇文章,知道世上有人对钱先生的书还能说道几句。



鄭文隽十二歲書

郑文隽(育才小学五年级学生)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刊采编中心 王辉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rbwh@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